



毛泽东与周恩来

胡长明 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毛泽东与周恩来

胡长明 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毛泽东与周恩来/胡长明著.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9
ISBN 7-80199-314-4

I. 毛… II. 胡… III. ①毛泽东(1893—1976)—生平事迹
②周恩来(1898—1976)—生平事迹 IV. ①A752 ②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04856 号

书 名: 毛 泽 东 与 周 恩 来

作 者: 胡长明

责任编辑: 解卫东

出版发行: 中共党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芙蓉里南街 6 号院 1 号楼

邮 编: 10008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密兴印刷厂

开 本: A5

字 数: 500 千字

印 张: 19.5

印 数: 5001—9000 册

版 次: 2005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

ISBN 7-80199-314-4/K · 250

定 价: 36.00 元

此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请与中共党史出版社发行部联系
电话:82517249,82517244

走进两个世纪伟人的思想深处

——《毛泽东与周恩来》序

在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中，毛泽东、周恩来是最具个人魅力的两位政治家。在性格特征上，毛泽东劲直尚气，举重若轻；周恩来精细雅致，举轻若重。在相互关系上，他们的合作长达近半个世纪，这在世界政治史上都是一个奇迹。在思想理论上，他们的智慧均涵盖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各个领域，彼此既有互补与传承的关系，也有切磋和发展的关系。在历史影响上，他们的名字、思想和事功都将会长久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但影响的侧重点又有所不同。

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许多人物都有比较研究的价值，比如龚自珍与魏源、曾国藩与左宗棠、康有为与梁启超、孙中山与黄兴、毛泽东与周恩来等等，但其中最令学者感兴趣，最让民众关注的当属毛泽东与周恩来。我作为胡长明同志攻读博士学位的导师，之所以全力支持并指导他研究这一课题，主要是因为有如下两个方面的考虑：

首先，该选题既符合学术研究发展的规律，又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几十年来，国内外对毛泽东、周恩来的文集汇编和单独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就国外而言，出现了一批相当有份量的著作，如美国学者斯图尔特·斯拉姆的《毛泽东传》、英国作家迪克·威尔逊所著《周恩来传》等；就国内而言，《毛泽东年谱》（1893~1949）、《周恩来年谱》（1898~1976）、《毛泽东文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周恩来选集》（上、下卷）、《周恩来外交文选》、《周恩来经济文选》等许多资料均已出版。

1993年和1998年,以纪念毛泽东、周恩来诞辰一百周年为契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单位相继发起组织全国毛泽东生平思想研讨会和全国周恩来生平思想研讨会。这两次研讨会都体现了较高的学术水准,是对国内研究毛泽东、周恩来生平思想状况的大检阅。不仅如此,国内外对毛泽东、周恩来的比较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如前苏联科学院院士齐赫文斯基撰有《周恩来》的长篇论文,收录在他主编的《中国:人物与事件中的历史》一书中。该论文剖析了毛、周在对苏外交政策上的分歧,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问题。前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舍维廖夫的论文《周恩来在中共“八大”上的报告与反“冒进”斗争》,对毛泽东、周恩来在1955年夏开始产生的经济工作方针上的矛盾及其影响进行了比较和分析。日本学者鸟居民所著《周恩来与毛泽东——周恩来试论》,是国外少有的专论毛泽东与周恩来关系的专著。该书将周恩来的政治主张和生平置于另一政治主导人物毛泽东历史的发展演变之中,在对比中描绘出周恩来、毛泽东的政治性格和政治肖像。

国内对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比较研究,严格说来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的。1986年,人民出版社和外文出版社联合出版方矩成、姜桂依先生撰写的《周恩来传略》,该书第八章“是人,不是神”,以大约一万多字的篇幅,从比较研究的角度探讨了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系,虽然是粗线条的,但却开了这方面研究的先河。此后,周毅之的《周恩来的行政哲学》、陈晋的《毛泽东的文化性格》、石仲泉的《周恩来的卓越贡献》等,也在部分章节涉及对毛、周的比较研究。既然国内外对毛泽东、周恩来的单独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且比较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那么从学术研究本身的规律而言,对两者的个性特征、思维方式特别是各个领域的思想进行全面、系统的比较就既有可能,也有必要。人们越来越感到,只有对毛泽东、周恩来个人的思想主张进行全方位的比较研究,才能走进更加真实的毛泽东和周恩来,也才能加深对风雷激荡的20世纪中国历史进程的理解。胡长明同志选择这一课题,体现了敏锐

的学术眼光和驾驭重大研究项目的勇气。

其二,从胡长明同志的工作经历和学术积累而言,他有从事这方面研究的条件和能力。

胡长明同志从1982年起就在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工作,曾担任该馆研究室主任多年。因为工作的关系,他与江苏淮安周恩来纪念馆、南京梅园新村周恩来纪念馆也有密切的学术往来。他长期注重收集和整理有关毛泽东、周恩来生平思想的资料,特别是对他们早年的家族背景、文化习染更有深切的了解。从1987年到1990年硕士研究生毕业,他在省级以上报刊就发表有关毛泽东、周恩来生平思想方面的论文30余篇。1993年到1998年,他相继单独或与人合作编写了《〈韶山毛氏族谱〉(注释本)》、《毛泽东青春岁月》、《毛泽东遗物事典》、《大智周恩来》等著作,为开展毛泽东、周恩来个人思想的比较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98年又考入湖南师大攻读博士学位。那时我在湖南师大忝列博士生导师,对其了解较深。胡长明同志思维活跃,勤于探索,治学异常刻苦。在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期间,研读了大量中外学术作品。就我所知,他对中国许多的传统古籍如《老子》、《庄子》、《韩非子》等都下过苦功,有比较扎实的文史功底,又有比较强的独立研究能力。鉴于他的工作经历和学术积累,我相信他有条件和能力完成这一重大课题。

胡长明同志撰写的这本《毛泽东与周恩来》,即将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这是从人格特征、思维方式特别是思想理论角度全面比较毛泽东、周恩来的极为严肃的一部学术著作。与以往的研究成果相比,本书至少有如下新意和创见:

一是关于早年性格特征的比较研究。已有不少学者从家庭背景和经历入手对毛、周的人格特征进行比较,而本书则将视野进一步拓展到家族和地域文化。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主要的社会生活便是家族生活。因此,家族和地方的传统思想和精神对一个人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通过对韶山毛氏族谱和绍兴周氏家谱的深入研究,胡长明同志认为“韶山

毛氏家族的最大特点是具有从军打仗的传统，尚武精神十分突出”，而“周氏家族则有外出当师爷的传统，推崇一种‘温、良、恭、俭、让’的人文精神，幕僚文化十分发达”。前者的“武略之美”与后者的“文事之优”恰成明显的对照。在毛泽东、周恩来身上，人们不难看出其家族长辈某些群体性格的影响。这种分析丰富了人们对毛泽东、周恩来早年性格特征形成原因的认识，富于学理性和逻辑性。

二是关于毛泽东、周恩来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在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中，毛泽东、周恩来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了解最深的两人。过去学界就毛泽东、周恩来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发表了许多看法，但究竟毛泽东、周恩来是如何从总体上认识并继承传统文化的，特别是中国传统人生哲学中对他们影响最大的核心观念和中心命题又是什么，还少有人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进行过探索。本书认为，中国传统人生哲学对毛泽东影响最大的核心观念莫过于“内圣外王”。毛泽东一生将学问与事功的高度结合视为完美的人生境界，而周恩来则极为推崇老子所说的“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其经历充分体现了“不以有有为，因此才有有”的人生哲理。此外，毛泽东、周恩来虽然都主张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但他们对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传统文化的态度是有一定差异的，毛泽东的情感取向十分明显地向传统文化中的下层文化、非正统文化倾斜，而周恩来则时时不忘提醒人们注重吸收上层文化、精英文化中有价值的东西。他明确地说过：“在旧社会，劳动人民身上有不少好东西，但在统治阶级中的一些人身上也有好的东西。”

三是关于各个领域思想的比较研究。这是本书毛、周比较研究的重点。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还受到某些流行观念的束缚，简单地认为“谋事在毛，成事在周”。即便是从周恩来对毛泽东思想的贡献这一角度来立论的著作和文章，也习惯于罗列周恩来的所有正确思想，并比较笼统地将其称之为对毛泽东思想的丰富和发展。至于哪些是对毛泽东的思想的阐释，哪些是对毛泽东原来提出而后来又放弃的正确思想的坚持和

发展,哪些是周恩来的独创性贡献,哪些是周恩来对毛泽东个别错误思想的扬弃,却缺乏深入细致的考察。本书作者认为毛泽东的思想与周恩来的思想当然不可等量齐观,毛泽东是毛泽东思想的主要贡献者,其思想与影响无疑占主导地位,但决不应低估周恩来的宏观思考能力和决策能力。鉴于学界对毛泽东与周恩来个人思想比较研究之不足,本书以毛、周恩来的系统比较为重点,并以专题的形式,对毛、周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等领域的思想进行条分缕析的比较,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有同说同,有异说异。这些比较以丰富翔实的史料为基础,在强烈的对比和映照中,呈现周恩来对毛泽东思想的补充、丰富和发展,凸显毛泽东、周恩来的政治性格和思维特征。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胡长明同志把毛泽东、周恩来的思想归纳为以下几种关系:一是创始与发展的关系;二是相互补充、交相辉映的关系;三是互相借鉴,螺旋上升的关系;四是同中有异或异中有同的关系;五是先异后同或先同后异的关系。虽然这些归纳还可进一步推敲和完善,但总体上来看是富于创见的。如果不经过深入的思考和对比,不可能得出这些结论。

本书的创见当然不限于以上几个方面,可以说在每一章中都有不少新意。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杨胜群先生审阅书稿时指出:“《毛泽东与周恩来》是一部对毛泽东、周恩来的思想和风格等进行比较研究的严肃的学术著作,是目前这方面研究成果中最有分量者之一。作品对毛、周之思想和风格等的异同及其相互关系,不是一般性地介绍,而是作了全面、系统、深入的探讨,资料翔实,论证谨严,富于个人的见解且持论有故。”杨先生的看法显然是客观而公允的。

要进行毛泽东、周恩来思想的比较研究,仅资料收集和阅读就是一件浩大的工程。胡长明同志积十多年之功,阅读了所有已经公开出版的毛泽东、周恩来的著作以及研究他们生平思想的中外重要论著,作了大量的读书笔记,其中的艰辛和努力,我想稍有学术眼光的读者都是能够体悟的。

作为本课题的指导老师,我深知研究这一课题的艰难。就学术研究的规律来说,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只能算是一个阶段性的成果。由于本书结构宏大,需要加以探讨的问题众多,而作者又限于精力、时间特别是资料收集等困难,以至于一些值得比较的问题未曾涉及或者失之简略,造成了一些缺陷和遗憾。从总体上看,该书在关于毛泽东、周恩来的思想与当代中国的联系,关于毛泽东、周恩来的历史影响等方面的比较上还有待加强和提升。从具体内容看,军事思想方面的比较还有较大充实的余地。比如,在“战略战术论”一节中,作者对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周恩来大兵团作战的思想以及大规模运动战、阵地战、攻坚战的情况论述较少,而解放战争时期又正是毛泽东、周恩来军事思想的成熟期;又比如,在“军队建设论”和“国防建设论”中,作者虽然涉及毛泽东、周恩来对尖端武器和对多兵种协同作战的认识,但对一些重要的战略和军兵种,如第二炮兵、通信兵、防化兵等缺乏专门的论述。这些都有待作者以后进一步思考和补充。如该书有再版的机会,我希望作者能弥补以上这些缺陷。

学无止境,后胜于今,愿胡长明同志在学术之路上继续奋斗,勇猛精进,为毛泽东、周恩来生平思想的研究作出更大的贡献。是为序。

郭汉民

2005年8月于湘大北山

前 言

在巨人的脚下，我们听到历史的隆隆惊雷。

作为 20 世纪中国的重要标志性人物，毛泽东、周恩来以如椽之笔改写了中国与世界的历史。他们之间的“天作之合”不仅产生了巨大的政治震撼力，而且也具有令人神往的美学境界。在中外政治史上，虽不乏两人并称的例子，但与“毛、周”相比，其逊色之处便不难立见。国外学者曾用“航海家”与“水手长”、“理论家”与“实行家”、“董事长”和“执行董事”、“海洋”与“海岸”等多种比喻，力求逼近两人关系的本质。

(一)

天安门广场矗立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碑名由毛泽东手书，碑文由毛泽东撰文、周恩来手书。毛泽东的书法笔走龙蛇，气势恢宏，周恩来的手书藏锋守锷，井然有序。这座纪念碑是他们政治上合作的一个象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认为，不是由于有毛泽东一个人，而是有他和周恩来两人合作，才使他们赢得了中国。

在遵义会议以前，周恩来在党内的地位高于毛泽东。遵义会议后，周恩来则成为毛泽东的主要政治助手。其后的四十余年，他们一直维持着这种合作的格局。可以说，两人政治合作的时间之长、内容之多、成效之著、境界之妙打破了世界纪录。当然也不可否认，在数十年的风雨历程中，他们之间也曾有过分歧乃至文化心理上的隔膜，然而并未从根本

上影响到他们相知互信的合作关系。回首往事,毛、周心路历程的盘郁错综、跌宕起伏,总能引发人们的无限兴味。

毛、周合作关系的长期延续,是由多方面的原因促成的。这首先自然是共同的政治信仰和抱负使他们走到了一起。但是仅仅指出这一点并不足以说明问题,其他的重要原因还有很多,我想主要有以下两点:

其一,由差异产生的互补效应。毛泽东、周恩来在出身、经历、性格、气质、思维方式、知识结构、爱好特长等方面有着广泛而明显的差异。这些差异就其主导性方面来说,并未成为他们之间合作和沟通的障碍,而是相反相成,产生出巨大的互补效应。中国古代思想家老子曾说:“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另一位哲人晏婴说:“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毛、周的政治合作正是一种基于差别性产生的和谐,也就是和而不同。毛泽东富于激情,举重若轻,有纵横江海、气吞山河的气势;周恩来则富于理智,举轻若重,有经纬万端、各得其宜的才华。当然,这只是相对而言。毛泽东的务实与理智,周恩来的激情与浪漫,在许多领域和方面也有充分的体现。日本学者鸟居民认为,毛泽东偏于理想主义色彩而周偏于现实主义色彩,二人互补性很强。1957—1958年间毛泽东作出的一系列重大决策表现了他浪漫主义者的色彩,而周恩来的务实色彩及勤奋工作,对于弥补毛的不足,挽回一些重大损失起了重要作用。^①美国学者约翰·吴德施指出:“在性格上,周与毛互有补充。他们是国民生活中两种成分的象征:一种是几个世纪以来受统治者们和地主阶级压迫的农民大众,另一种是受儒家思想熏陶而难于有所作为的知识分子,他们到处受到帝国主义势力的凌辱,又在外国侵略者面前束手无策;于是思想激进起来。两种成分汇合,形成红色浪潮,席卷了整个中国大地。”^②美国《时代周刊》的一篇特写还作了这样的评论:周恩来的才能

① (日)鸟居民:《周恩来与毛泽东——周恩来试论》,东京草思社1975年版。

② 见方矩成、姜桂依编《西方人看周恩来》,中国和平出版社1989年版,第126~127页。

“一直同毛的任性而富于幻想的才能配合得很默契。毛的天才表现在探索广泛的理论问题,不像周那样擅长管理行政大小事务”。^①但是,并非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所有相异之处,都能和谐相济,特别是到了毛泽东的晚年这段时间,他们相互的不同之处,有许多不仅不能互济互补,而且成为他们相互沟通的障碍,这主要是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和中国政治文化中的特定落后因素使然。

其二,由相知而产生的相互依赖。毛泽东、周恩来彼此有着很深的了解,对对方的为人和心理特点都心中有数。毛泽东认为周恩来“是个好人”,他没有个人野心,因此也从不拉帮结派,而且他精明能干,办事极负责任。反过来,周恩来视毛泽东为“帅才”,是理想的领军式人物,他善于抓主要矛盾,不喜欢在细节问题上作过多的纠缠。这种由相知产生的相互依赖,使他们之间的智能互补获得了更为坚实的基础。埃德加·斯诺说过:“他们两人的关系,最恰当的说法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两人的工作作风和性格为人,相差很大,但毛同周相辅相成,共事 37 个年头,彼此信任,又相互依赖。”^②加拿大学者切斯特·朗宁在《中国革命年代回忆录》中写道:“在毛身上,周看到一个受革命的西方思想鼓舞着的领袖人物,看到一个根据自己是农民儿子的经验而创造发明了一个新型务实主义的中国哲学的人。周自己没有个人野心。他在毛身上,看到作为领导人应具备的品质,而这些品质是独一无二的。这样的一个人深深扎根于中国的农民阶层,并且已为导致现代革命的变化献身,只有这种变化,才能使国家现代化和挽救中国。在周身上,毛看到对事业全心全意献身,准备做任何牺牲的一个聪明过人、宽容大量、第一流的组织者和政治家。他在周身上,看到他具有鼓舞别人献身革命的卓越才能,而这样的革命能够把中国从外国压迫和内部一蹶不振的状态中挽救出来。”^③

① 见方矩成、姜桂依编《西方人看周恩来》,中国和平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65 页。

② 见方矩成、姜桂依编《西方人看周恩来》,中国和平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45 页。

③ 见方矩成、姜桂依编《西方人看周恩来》,中国和平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7~8 页。

毛泽东讲起话来,常常是海阔天空,国内国外,滔滔不绝,但综合起来,要点何在,如何贯彻,别人未必全明白,但周恩来却领会得比较透彻。余下的事就由他组织去办,而且办得井井有条。著名学者梁漱溟先生向来是不大轻易抬举人的,但他承认“周恩来是绝顶聪明的人”。周恩来有罕见的把握事务本质的能力,他能从一大堆复杂的事务中迅速分辨出哪些是主要的、需要立即解决的,而把无关紧要的东西撇置一旁。即使是一团乱麻他也能迅速理出头绪,所以毛泽东多次称赞周恩来是个“好管家”。

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才智十分佩服,但他也并非在毛泽东面前诚惶诚恐。有人认为延安整风后,周恩来便对毛泽东产生了某种迷信和恐惧,我并不这样认为。至少在20世纪50年代前期,周恩来发表意见还是相当坦率的,如1954年他便说过这样一段话:“有人说我国的自然科学很落后,社会科学不一定落后,革命胜利了,又有毛泽东著作。不,社会科学的水平还是很低,革命的胜利是由于政治觉悟,我们还很少把革命经验提高到科学理论水平上来。”^①这虽然讲的是事实,但在党内敢说这种话的恐怕也不多。由此说明在与毛泽东的关系上,周恩来当时的心态是比较自由和放松的。当然,在政治舞台上,周恩来也自有他的一贯风格,这便是拥护特定时期的最高领导人,不组织属于自己的宗派,避开意识形态的争论,对外部环境保持高度的敏感性和适应性。

(二)

社会上普遍流行一种说法,即毛泽东是决策者,周恩来是执行者,或者说“谋事在毛,成事在周”。这种说法一般来讲当然是对的。自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周恩来的合作格局逐步形成并固定下来,毛泽东统筹全局,着重于战略设计,周恩来负责具体组织和政策的执行。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周恩来还有意识地使自己主要扮演

^① 《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83页。

执行者的角色。建国初期,有人曾问过周恩来:你为什么不做些理论方面的工作?周恩来说:你怎么也讲这个话?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有那么多具体的事,总要有人去管它。我多管些这样的事,就可以让毛主席有更多的时间去考虑一些更大的问题。^①这些情况难免给人们乃至不少研究者这样一种印象,即周恩来没有多少思想和决策能力,从而直接影响到对毛泽东、周恩来之思想比较的深入。

“谋事在毛,成事在周”只是一种相对的说法。很难设想,作为一个大国的总理,不需要经常做宏观上的战略思考。实际上,周恩来也是一个有战略眼光和重大决策能力的政治家。英国人詹姆士·麦克唐纳的说法比较近情。他认为周恩来扮演着两个角色,一是在政策决定之前当顾问,二是在政策决定之后当执行者。^②在不少宏观问题上,他的思想和毛泽东是有差别甚至是有重大差别的,而且即便是执行决策,也不是一个简单机械的推演过程。周恩来多次说过,毛泽东是搞战略的,他只能搞点战术,当助手是否当得好,还没有把握。这虽然是自谦之词,但也说明了一个事实,即实施政策的过程是一个与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因而也需要讲求方式、方法和策略,有时还要加以必要的修正。周恩来许多重要的理论创见恰恰是在执行政策过程中产生的,这方面的事例不胜枚举。最有代表性的是新中国的文艺政策。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后,文艺政策是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基本依据的。但由于时空的转换,这个讲话的不少内容并不完全适应变化了的现实。周恩来正是在执行政策的过程中,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在新的历史制高点上推进了毛泽东的文艺思想。

毛泽东的思想自成体系,这是公认的事实,至于周恩来的思想是否是一个体系,这里不作妄断,但周恩来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对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诸领域的问题进行过深湛的思考,却无人

① 见金冲及《关于“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对话》,载《党的文献》1993年第2期。

② 见方矩成、姜桂依编《西方人看周恩来》,中国和平出版社1989年版,第201页。

可以否定。周恩来知识结构上的均衡，在国内外的政治家都是罕见的。毛泽东的思想与周恩来的思想在不同的主题、不同的领域、不同的层次等问题上构成十分复杂的对比关系，只有进行扎实的比较研究，才有助于进一步认识他们的政治性格和理论贡献，以及他们的一致与分歧对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影响。

首先，从不同的主题来比较。毛泽东一生主要的理论创造是在民主革命时期。他对中国国情的熟悉和对人民大众需要的敏锐直觉，使他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的成功结合，圆满地解决了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怎样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重大历史课题。在怎样推翻一个旧世界的问题上，无人比他更有办法。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也有若干重要的理论创造，其中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所取得正确认识，后来被有机地融汇到邓小平理论之中。但从总体上看，在怎样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方面，他的知识和经验逐渐呈现出较大的局限性。与之相比，周恩来缺少毛泽东那种革命年代所需要的领袖人物的超凡想象力，特别是对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国情的认识与毛泽东存在一定的差距。在遵义会议上，他全力推举毛泽东，说到底，是因为他深信这场革命注定需要一位深谙中国各阶级各阶层的状况和习性，以及中国社会的内部结构和运行规律，而且具有杰出军事才能和超凡魅力的人来领导才能成功。然而，在怎样建设一个现代化国家方面，我们又不能不承认，周恩来特别富于远见卓识。他牢牢抓住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几个重要条件，如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充分尊重知识分子、大力发展科学技术等。当然，囿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周恩来也不可能形成完整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尤其是他也难以摆脱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

其次，从不同的领域来比较，毛泽东的军事和政治才能举世公认。在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毛泽东的军事和政治谋略使中共屡屡出柳暗而见花明。遵义会议上，毛泽东被推举为党和红军的实际最高领导人，

这决不是什么偶然。对于一个从事武装斗争的政党来说,军事才能是决定谁成为领袖的最为关键的因素。周恩来最早就是把毛泽东当作一个军事天才来看待的。1932年10月宁都会议期间,毛泽东受到排挤,而周恩来却尽力争取毛泽东留在前方指挥作战。他在给中央局的电文中说:“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供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①。延安时期,周恩来又充分认识到毛泽东在政治上纵横捭阖的能力。1943年8月,他在回到延安的演说中说:“没有比这三年来事变的发展再明白的了。过去一切反对过、怀疑过毛泽东同志领导或其意见的人,现在彻头彻尾地证明其为错误了。”“我党二十二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穿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②这表现了对毛泽东领导能力的心悦诚服。

反过来,周恩来的外交和经济才能也有口皆碑。周恩来对世事的洞明和对人情的练达,是他成为卓越的外交家和谈判能手的重要条件。没有人能够像他那样在党内党外都有广泛的联系,甚至在敌对阵营中也拥有数量不少的朋友。拿英国作家迪克·威尔逊的话来说,即使是魔鬼他也能从其身上榨出一些好处来。蒋介石曾经感叹:周恩来“的确是一个不易应付的对手”。毛泽东向赫鲁晓夫介绍说:“周恩来很有才干,在大的国际活动方面,他比我强,很善于处理各方面的关系,灵活地解决问题。”^③建国前,中共对外所有的重大谈判、交往活动都是由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集体讨论决定,然后主要交由周恩来等具体执行的。即使是1945年国共两党的重庆谈判,虽然谈判的方针、决策在毛泽东主持下于延安早已确定,但具体谈判事宜仍由周恩来主持与对方进行。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主管外交工作,对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拓展中国的

① 见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898—1949),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6页。

② 《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8页。

③ 见曹应旺编著《周恩来经历记述》,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97页。

外交空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提出的“求同存异”、“以民促官”等外交思想不仅极大地拓展了中国的外交空间，而且在理论上也是对外交学的重要贡献。

作为新中国经济建设的组织者，周恩来致力于以循序渐进的方式推进中国的现代化，但他的努力在毛泽东的强力干预面前屡遭挫败。许多学者如李锐、廖盖隆等都曾指出毛泽东不太懂现代化的大生产，不擅长经济工作，这是实事求是的说法。毛泽东对经济建设的复杂性缺少认识，1958年初他曾经说过：“搞工业，搞农业，难道比打仗还厉害些？我就不相信。搞经济就那么复杂，那么多学问？”^①在毛泽东看来，天下之难事莫过于打仗，既然打仗都难不倒他，那其他的事自然不在话下。他没有意识到经济规律这个无形的“敌人”比战场上有形的敌人更难对付。而周恩来在1957年3月却指出：不能说建设比革命容易，“在某一个意义上说，建设比起万里长征来，可能是困难要少一些。但是，从另一个意义上说，在我们这样落后的经济基础、落后的文化基础上，我们的知识这么有限，我们对于建设、对于科学的经验这么少，建设也许比革命更困难”^②。1956年，针对经济工作中的冒进倾向，周恩来以“抗大流”的精神力主采取降温和减压的方针，但却遭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从1958年起，毛泽东到前台指挥经济工作，发动“大跃进”，结果造成了严重的灾难。经此一劫，毛泽东才认识到经济工作并非如他想象的那么容易，同时也才真正了解了周恩来的经济才能。1960年他在《十年总结》一文中写道：“一九五六年周恩来同志主持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了三年余地，多么好啊！”^③周恩来毕竟在日本、法国等地留学过，比很少踏出国门的毛泽东视野更为开阔一些。他熟悉现代化的大生产，懂得要切实地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20世纪60

① 见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上卷，南方出版社1999年版，第79页。

② 《周恩来经济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47~348页。

③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14~215页。